

Opinion · column

Forum

上论坛

接连出现的迪拜世界事件、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表明,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或许有可能再爆发一场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规模的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明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因此将更为复杂。房价的调整,乃至消除泡沫需要严厉的紧缩政策,但过度紧缩会抑制经济复苏,而温和的手段又很难控制通胀。两者之间火候怎么控制,煞费思量。

如何把握收放:明年中国经济最大悬念



管清友

当前经济形势十分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很多,这大大增加了我们判断经济形势的难度。在迪拜世界事件、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出现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已过去,但现在看来金融市场仍然很脆弱,危机并没有结束。12月以来,美元大幅走高,与主权债务危机有很大关系。目前欧元区国家财政状况普遍较差,而西班牙、墨西哥、委内瑞拉、乌克兰等国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希腊”。如果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美元将再次成为金融市场的避风港,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国必须密切注意资本流动,加强监管,避免因资本大进大出给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美国要实现“再工业化”,主要发达国家要解决国内失业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可避免,其中大部分会针对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1月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突破百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看来,贸易保护主义还会加剧,这使得中国经济从“向外”到“向内”的转变成为趋势。也正好给中国提供了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契机。大规模的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要通过限制落后产能,刺激有效需求来解决(石化产业目前是唯一没有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但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显现)。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分配的调整,不调整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很难实现。

据相关媒体12月25日的报道,亚洲两大新兴经济体——越南和印度,均宣布出现了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越南国家统计局称,因米价高涨,推高了食品成本,越南消费价格指数本月同比上升了6.52%。这一通胀率为今年4月以来最高。同时,越南经济加速升温,也推动了国内消费需求。12月越南的通胀率在11月4.35%的基础上继续爬升,且为连续4个月上升。印度也宣布,由于土豆和菠菜价格上涨(土豆同比涨价2倍以上,菠菜涨价37.9%),印度食品批发价格指数已接近11年来的最高点。

按中心——外国理论,中心国家(如美国)爆发危机,外国国家很难避免爆发危机。若依照这样的推论,一种比较悲观的情景是,金融危机在美国(资产泡沫破裂、金融系统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危机)依次爆发。如此,或许有可能再爆发一场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规模的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对此,笔者以为,我们宁可把形势估计得严峻一些。由此观之,明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将更为复杂。据历史观察,在前两轮宏观经济周期中,经济高速增长带来CPI大幅飙升,经济下滑导致CPI更急剧下滑,两者波谷在同一年出现。而经济敏感商品的期货价格指数CRB与PPI变动高度相关,且CRB指数领先于中国PPI的变动,这反映了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到国际商品市场的影响。从货币指标与通胀指标的比照看,M1领先CPI指标6个月,M2不明显。从MI与CPI的历史关系来观察,明年的CPI增幅可能会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与许多经济学家的判断一致,温和上涨,约3%左右;第二种,增幅继续维持低位或负增长(1%及以下),这似乎不太可能;第三种,鉴于目前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明年CPI增速可能会加速上涨(超过3%,甚至更高)。货币管理当局要管住通胀,必须要打好提前量,并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

对明年个税调整的殷切期盼

刘英团

一般公众对个税的印象,茅于軾先生曾经指出,主要是从个税来的。个税是备受公众关注的税种,“个税起征点”始终是个“炒热”的话题,个税的每一次调整无不动着工薪阶层的神经。在目前陆续召开的地方经济工作会议中,确定的2010年财政收入目标,基本与2009年一致,并未随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而上调。国家税务总局已确定在明年实施一揽子减税政策。其中,“劳务报酬起征点(800元),未来有望调到与工资起征点(2000元)一致,而工资起征点有望提到2500元。至此,个人所得税问题再次引起国人的热切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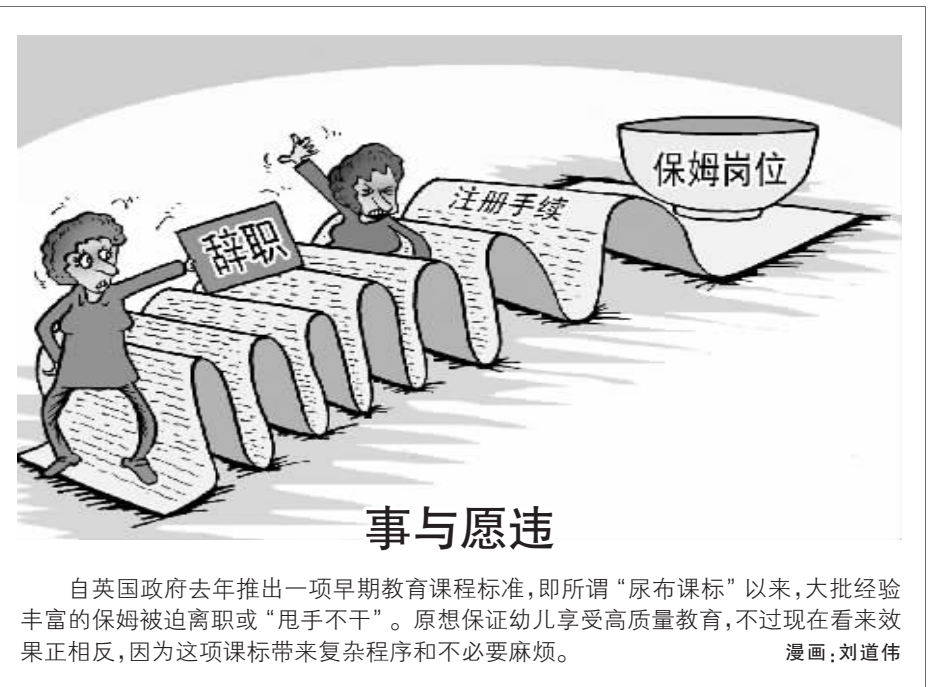
尚不到总人口的2%的理由,似乎起征点非但不该提高而且应当大幅降低。这显然与社会民意距离太遥远。据《环球时报》报道,65%的个税来自个税缴纳群体80%的中低收入者,而占个税缴纳群体20%的高收入者,占有银行存款总量的比例高得惊人,其缴纳的个税的比例不到税收收入总量的10%。若把这些所有的因素联系起来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广大中低收入者正是巨大的税负极的纳税人。而现行的个税并没有体现出多少调节贫富差距的杠杆作用,也没体现出多少“比例平等”或者“按比例贡献”的原则。在事实上,造成低收入者税负高而高收入者税负低的严峻局面。

再看统计数据,今年1至6月,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29530.07亿元,同比下降6%,减收1895.68亿元,然而,个人所得税却同比增长0.7%。占税收收入大头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都处于下滑阶段,个税却同比增长,这意味着很有必要对个税进行深层次改革。

事实上,从表面上看,个税起征点提高后,工薪阶层纳税人人数是减少了,但是减少的是工薪阶层纳税人中的低收入人群,中高收入工薪阶层不仅依然是缴纳个税的主力军,而且由于税率并没有调整,他们的总体税负并没有减轻。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也即真正的高收入者,也并没有成为缴纳个税的核心力量。无论起征点多少,都只是针对个人,没有计算家庭人口,没有考虑赡养系数。你说,个人收入同样是2500元,两个人都就业的家庭和两个人就业的单人家庭,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有多大?因此,仅仅提高劳务报酬和工资税负起征点远远不够,下一个调整的深层次改革,就应从纳税人就业状况的变化、家庭赡养人口的变化入手,以区别对待。(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观察通胀,只看CPI增幅显然有失公允。如果从资产价格角度观察通胀,通胀早已存在。流动性充裕的条件下,货币会追逐具有保值增值功能的商品,金融市场上的大宗商品、房地产等都是投资者的主要投资目标。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买房是投资的首选,但房价上涨了带来了货币贬值效应,并远远超过CPI上升对他们的影响。国家启动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未能走出低谷,就与高房价有很大关系。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经济刺激计划的受益者,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自去年中下旬后借助经济刺激计划的“东风”迅速反弹。同期,新开工面积和销售面积增速也出现较大反弹,但销售面积增速远远大于新开工面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初以后国内房价迅速攀升。本来,国内房价增速已随着中国经济的调整而下降。在2007年末到2009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销售面积、新开工面积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都出现了下降,但销售面积的下降大大高于新开工面积和开发投资面积增速下降,房价也出现了下滑迹象。因此,经济刺激计划改变了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轨迹。未来房价的走势将取决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走势以及国内外的货币环境。

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政府对房地产业的态度是希望通过房地产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但同时又不希望房价涨幅过高,引发社会矛盾。现行土地所有制导致政府成为土地的唯一供给方,土地财政又导致地方政府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在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房价上涨就不可避免。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出台了很措施。近期,财政部、国土部等五部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土地出让收管理的通知》,针对土地出让金作出规定“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特殊项目可以约定在两年内全部缴清,首次缴款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款的50%”,但是,这一规定会导致一批资金实力不强的小开发商无地可拿,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开发商获得土地的成本降低,进而造成住房用地集中在大型开发商手中。这种结果必然造成住房投资的减少,进一步加剧住房市场的供需矛盾,房价过快上涨仍难以被遏制。房价的调整,乃至消除泡沫需要严厉的紧缩政策,但根据以往的经验,过度紧缩会引起经济下滑,抑制经济复苏,而温和的手段又很难控制通胀。两者之间的火候怎么把握?这是明年中国经济的最大悬念。(作者系宏观经济研究学者)



自英国政府去年推出一项早期教育课程标准,即所谓“尿屎课标”以来,大批经验丰富的保姆被迫离职或“甩手不干”。原想保证幼儿享受高质量教育,不过现在看来效果正相反,因为这项课标带来复杂程序和不必要麻烦。 漫画:刘道伟

中国金融改革有条特殊路径



丁骋骋

从内在逻辑上讲,中国金融改革遵循着“机构改革—市场改革—制度改革”这样一种特殊路径。这鲜明地表现出中国改革的特点,即它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这几乎与麦金农提出的关于经济市场化“先国内后国际,先简单后复杂”的次序不谋而合。所以说,中国金融改革的路径安排不是内生的,完全是外力推动的结果:先是国企改革推动了金融机构改革,然后金融机构改革推动了金融市场化改革,而金融市场化改革又推动了金融法制与监管的完善。而国际化要求同时推动了机构、市场与制度的改革。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金融改革存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

就纵向而言,金融改革主要包括机构、市场、制度改革三个方面,三者之间存在着层层递进的关系,也有自成体系的独立性。机构改革不仅包括已有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革,也包括新金融机构不断组建。中国金融改革从机构改革开始,而且一直表现为“机构改革主导型”的特征。这与我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有关,也与我国长期以来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有关。金融改革不仅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也包括期货市场、黄金市场等等。就金融改革的第二个维度而言,是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其间经历三个关键性的阶段。笔者作这样的区分,是因为1994年至2001年分别是我国金融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两年,因此可将1979年至1994年视为第一阶段,那时主要以机构改革与市场改革为主导,主要表现为从“大一统”的银行单一格局向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转变,由单一银行融作为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同时并存的局面。第二阶段为1994年至2001年,主要以制度改革为主导,具体表现为人民币利率体制改革及金融立法的不断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结构日益多元化,融资结构和金融资产也日益多元化。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金融改革日益国际化方向发展。2001年加入WTO,对金融改革国际化方向发展带来极大推动。2006年我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一切审慎性市场准入限制,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另外证券市场开始进入国际化的发展时期,2002年QFII, QDII两项制度相继推出。2005年人民币实行汇改。2009年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也跨出重要一步。

金融改革的两个维度相互交叉,相互融合。从以上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金融改革不仅有自己的创新,但主要是对西方的学习、参照和吸收。作为政府主导型的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金融改革必定需要先行先试的理论作为其指导,而这首先得益于我国对外开放度不断加大,这样国外的先进理念能够被大量吸收,并成功移植到中国金融改革的众多试验中。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金融改革仍然不得不在“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中国金融改革是“演绎式决策”(以国外成功经验或经典理论为依据)与“归纳式决策”(以事实或特殊情况为依据)共同作用的结果。相比之下,“演绎式决策”起到更为主导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比如各类金融工具创新,其实大多参照国外的实例。再比如推出大量金融机构、颁布及修订各项金融法律、利率市场化与外汇体制改革,以及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方向改革等,也都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我国金融改革诸多地方,理论远远落在实践后面。中国金融改革的这种演绎式特征,集中地可以从30年来人们对“金融”一词的认识,或者金融学教育的演变体现出来。传统的《货币银行学》教材中,人们将“金融”的功能仅仅停留在“资金融通”。与此相对应,在1979年之前,国人总是将金融简单地区分于为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服务(甚至仅仅是出纳,比如建设银行本来就是财政部下属的一家机构)。但现在的《金融学》教材中,国人已认识到了“金融”不仅是价值增值、增值的工具,也是风险分散、价值承担的契约,甚至也是人类获得更大自由的一种有效制度。说实话,汉语的“金融”与英语的“Finance”,其实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似乎正好说明了中西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然而,随着国人对金融一词理解的不不断深化,中国金融改革也正在逐步实现从“动员性金融”向“资源配置性金融”,乃至“服务型金融”的转型。可以预期,未来10年内,中国金融改革必定会在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以及金融管制等三方面有较大变化。中国金融体制将进入一个质的提升阶段,但同时这也将是改革最困难的时期。(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

英国勉强保住金融优势



李俊辰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在半年前发布了一半年制《金融稳定报告》,称英国金融体系在过去六个月已经“稳定得多”。在一系列刺激性货币政策的作用下,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有所改善。这份一年两次的《金融稳定报告》主要目的是回顾和评估半年来的金融运行市场情况,提出今后改进意见和建议。

自今年3月以来,英格兰银行始终保持短期利率维持在0.5%的历史最低水平不变。12月10日,英格兰银行再次决定将主导利率继续维持在这个历史最低水平不变。这是该行连续第9个月决定将利率维持在这一低水平。为刺激经济复苏,从去年2月到今年3月,英格兰银行共8次下调利率,降幅为5个百分点。今年第三季度,英国经济已连续6个月负增长,是西方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仍未出现增长的国家。而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已表示,英国经济将于今年内恢复正增长,但今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仅增长1.5%左右。

当然,英国人也喜欢“自我解嘲”。《金融时报》就有一篇文章说,即便陷入经济衰退,英国GDP增速也远高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或日本。从1991年一季度到2009年三季度,英国GDP增长了48%,同期内法国的增长幅度为35%,德国为22%,意大利为19%,日本则为16%。在7个主要高收入国家里,只有美国和加拿大的表现(分别增长63%和60%)优于英国。不过,他们也承认,这种增长中肯定有一部分是虚幻的。但是,除非其他欧洲国家和日本的表现将出现明显改善(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英国还是能保住扩张时期取得的大部分优势的。